

在兩難之間:論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十大關係*

劉京希

[提 要] 業界對於學術期刊性質及其職能的認知,向有歧見。就其職能定位而言,學刊存在的價值論意義,在“學”還是在“術”?就其角色定位而論,學刊乃被動性自在,還是帶有某種學術自覺的主體性存在?面對紛繁複雜的現實生活世界,學術期刊究當如何觀照?繼而,學刊選題之策劃,究竟是跟從時潮,還是預流學術以發掘潛在熱點?面臨迥然有異的兩種學術影響力之判斷路徑,是趨“硬”還是向“軟”?面對“扶植新人”的責任擔當與“延攬名家”的魅惑,是一身二任還是有所取捨?關涉學刊發展前景的編輯角色選擇,是走職業型專家之路,還是走編學兼修的“雜家”之道?之於綜合性學刊,其辦刊路徑以學科為導向,還是以問題為導向?在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之間,又當如何抉擇?在激烈的同業競爭態勢之下,刊際關係當為“同構化自在”,還是“差異化競爭”?不同之編輯理念,將決定相異的“關係”乃至其辦刊實踐之轉化。

[關鍵詞] 學術期刊 期刊文化 學者辦刊 評價正義 差異化競爭

[中圖分類號] G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1 - 0106 - 14

對於業界中人來說,言及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辦刊體驗,可謂酸甜苦辣鹹,任誰都會有一番苦衷想要傾訴。基於筆者多年編輯實踐的體認以及同業的啟發,本文梳理和討論了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辦刊實踐之中約略帶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的十個不同側面的關係問題。當然,由於觀察和思考之角度的不同以及主觀判斷的差異,在從業者的心目中,自有其為之所思所慮的不盡相同的“十大關係”,^①拙文實難予以精當概括與抽象。不當之處,還望方家教正。

一、期刊職能定位:在“學”還是在“術”?

業界對於學術期刊的性質與職能的認知,向有歧見。學刊乃學術成果發表之園地的“園地說”,因其流布甚廣而在刊界一直佔據主流地位。近期“引領說”趨於多見。該說認為,學刊在“園地”之基本職能而外,更被賦予引導學術風尚乃至“預流”之職能,從而具有學術發展之能動屬性。

此二說涉及學刊的本質和使命,或謂學刊存在的價值論意義。理念決定進路,不同的辦刊理念

* 本文係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編輯學重點課題“學術期刊守正創新與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研究”(項目號:ZD2021010)的階段性成果。

造就了期刊絕然相異的精神氣質和外在樣態。“園地說”主張期刊滿足於“從動”的工具屬性與定位,以反映、轉化和傳播學術成果為其職守;“引領說”則倡導期刊主動承擔“使動”與能動角色,一方面擔負反映、轉化和傳播學術成果之基本職能,一方面又以能動的姿態介入學術研究領域,通過主動發掘和設置議題的方式,引導學術論爭的進程。

就其根本意義而言,學術期刊之存在,即在於繁榮和推進學術事業,由此助益於對真理的尋求,以加快人類觀念文明的演化進程。換言之,學刊的存在價值,端在於通過編、作、讀的多元互動,致力於學術探索、發現與交流,以繁榮學術,求真知,進而助推人類文明進程。丟掉這一宗旨和根本追求,學刊即失去其存在的終極依據。

而所謂學術,是對於對象事物及其發展變化之規律與本質的學科論證。尤其是之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思想乃學術的靈魂。因此從理論上說,學術期刊不應僅僅滿足於基本的學術載體職能,更應通過對於“精神之學問”的觀照,成為思想引領、承載與轉化的物化形態。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業者應把期刊辦成既富學術性同時又不乏思想性的物化存在,以達成學術性與思想性相統一的理想狀態。學術研究講求系統、整體與創新,但限於學科規範,難免古板而拘謹。當我們轉而嘗試把思想性代入學術研究之中,學術便有了靈魂,從而直擊人性,打動人心,也就在靈動之中見出深沉,如陳寅恪所謂,透見精深遠大之思。相應地,作為學術成果呈現之載體,學術期刊也就不再總是那般死板,而是變得更加立體與鮮活,讓人備感親切,其傳播效果自然也如裝載了“功放器”一般,頓顯倍增之效。

概而言之,學術之謂學術,既在於其學與術的有機統一,更在於這一有機統一體擔負着人類至高精神追求——追求真知,去偽存真,釀就創見,形塑理念。此即王元化先生所倡導之“學術的思想與思想之學術”的渾然一體。而在“學”與“術”之應然關係層面,又以着意於參透義理的“學”為本,以注重於考據箋註的“術”為輔。換言之,所謂學術,可分為二重境界:“術”與“學”。學乃術的源泉,術乃學的功用;學乃形上論理,術乃形下歸納。滿足於詮釋與闡釋他人學理與學說的工作,或拘泥於數據整理、量化研究與經驗總括,是為“術”,屬於技能層次的研究。我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應當是術中有學,由術而學。司馬遷寫《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成一家之言”,在概念範疇與理論建構上有所創發,則屬“學”的境界,當然要高於術。“有道無術術可求,有術無道止於術!”只有將術與學相結合,有理有據地進行學理創發,成就一家之言,方為至高境界,你的作品因此也才有“嚼勁兒”,從而耐人尋味。如何達成此一境界,端看你如何儘快找到捷徑了。^②此一話題所及,實則是學術生產的機制和邏輯問題。

以之觀照當下學術期刊界的辦刊現狀,就思、學、術三者關係而論,受整個社會所彌漫的功利主義與經驗主義的深重影響,對“術”的偏好遠甚於對“學”的沉思,對“學”的追求又遠超於對“思”的終極追問;因此,呈現出術、學、思三個層級逐級遞減的態勢。其典型表現即在於,辦刊實踐多徘徊於走一步看一步的“看天吃飯”情形,滿足於“飯來張口”的“自在”狀態,而缺乏編輯主體意識介入和理念灌注之“自覺”、“自為”精神,以及深沉的社會關懷和執着的人文情懷。當然還表現於,以刊文為呈現形態的學術成果,緣於數媒時代的多重便利,近些年雖呈倍增態勢,卻多限於術策之論,看似欣欣然,實則類於高脂“快餐”,缺乏思想的凝重、銳度與耐人尋味,以及對於超驗性普遍價值的不懈追尋。由此來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界如欲有所突破,在辦刊理念上如何實現價值與追求的層級“升維”,以超越功利之用;在內容建設上如何走出輕飄與浮泛,轉向沉靜與凝重,將是未來一個時期所必須面對的亟待突破的嚴峻課題!

二、學刊角色定位：被動性自在還是主體性存在？

如上所述，對於學術期刊從業者而言，我們有怎樣的編輯理念，也就是我們怎樣認識和看待學術期刊的本質，決定了我們在編輯實踐之中如何塑造學術期刊。從對於事物的認知也即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待學術期刊，它應當是有生命、有性格的鮮活存在，是一種不乏主體性的精神存在。也就是說，它應當有主格、有品格、有刊格，它應當有自己的學術追求，力圖成為個性化的物質和精神之雙重存在，以完成推進學術事業之繁榮的使命。因此，就其存在價值和使命而言，學術期刊所最不應當成為的，是從業者藉以追求功利性外在目標的工具性客體——學術期刊這一事物自打出現以來，就未曾被賦予這樣一種被動性角色。

就此意義而言，從業者只有以上述的眼界來看待、認知進而經營和建設一本學術期刊，才有可能使之成為富有其本源價值的精神與物質呈現；進而，從業者的存在價值和職業使命才可得到更深層次的發掘與呈現。在這裡，從業者的存在價值已然與期刊的學術價值合二為一。

借用日本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的“古層論”，也許可以更加充分地說明學刊之主體性存在及其價值自覺。“古層論”認為，本土思想既不是域外思想、理論的複製品，亦不是絕對“自發”的產物，而是外來文化的絕對影響和“古層”的執拗性生存之矛盾的統一。換言之，文化的發展呈現層層堆積的形態，就像地質學中不同岩層的堆疊一樣。位於頂層的是抽象理論和學說，它們總是伴隨着對外來思想的吸收而逐漸下移至更為古老的古層。“文化古層所象徵的傳統思想，就像貫穿整個交響樂的一個不和諧的‘低音’，它總是在調和、修正和吸納其他聲音。傳統文化就是丸山真男所謂的‘執拗的低音’。”^③易言之，“古層論”的意思是說，任何一種文化若保持和維繫其主體性存在而不至於湮滅，必須在其存續過程中做好對於原發“古層文化”的代際傳承、發揚與時代性轉化。之於一本期刊而言，其自身生命進程中的“古層文化”也即自身傳統，是其在眾刊之林卓然而立的無形精神資本和支柱，須臾不可離。原因在於，“古層文化”是一本學刊的獨特文化符號和身份標識，由之使得一刊之“本我”得以呈現，以區別於他刊，進而在平等而自由的競爭中，成為自身主體性自覺與存在的合法性基礎。

因此而言，學刊之主體性自覺需要具備兩個邏輯前提。一方面，期刊自其誕生之日起，即要着意培育和逐漸養成自身的原發“古層文化”；另一方面，不同輩分的期刊人之間，更需要做好傳承與光大期刊“古層文化”的代際接力工作，使之在與不同時代之現實文化的層累性互動中，由孱弱的幼苗而茁壯成長為參天大樹，以作為一本學刊富有底蘊的精神命脈和軟性標識，最終為同業與外界所廣泛認可。當然，作為這兩個邏輯理路的先決前提，是有意識地打造期刊的獨特個性和獨有風格。原因在於，你的“古層文化”就隱含於期刊的獨特個性與獨有風格。如無獨特個性和獨有風格的形塑，一刊的“古層文化”也就與他刊的“古層文化”別無二致；也因此，一本期刊的存在也就因其雷同於人而失去其根本依據和獨有文化價值。

當然，刊界也不乏此類期刊，或者自創刊以來已經初步形成了自身傳統即“古層文化”，但由於後續承接者對此“古層文化”及其價值缺乏自覺認知，自然就談不上賡續與傳承，作為這本學刊的“古層文化”，便逐漸失去其活力而成為“遺跡”；或者是，自創刊以來，一刊就未曾形成自身特色或獨特個性，更談不上着意培育與形塑以個性為基礎和前提的“古層文化”，抑或未曾自發演進出獨特期刊文化進而形成自覺並予以擴展，以致於使得一刊的內質和樣貌，始終處於變幻不定、躍動不居的狀態。而上述兩種辦刊樣態所存在的共同問題，是因缺乏自身“古層文化”的精神積澱與錯

定,總是處於某種輕飄無魂的“失重”狀態;儘管辦刊歷史已然長久,卻總是難以形成為讀者所認可的期刊獨有風格和品牌效應。

就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界的實際情況來看,由於其主辦單位的學術位勢的差異,天然地賦予其以不同的外在品牌位格。但就軟實力層面來看,對於大多數期刊而言,其在讀者和作者心目中的品牌化地位的確立,無疑須經歷一個漫長的自然演化的歷程。所謂“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就是一本學刊為讀者所認可的形象化表達。當然,此間少不了辦刊人對於期刊風格的凝練、個性的養成、傳統的光大所付出的代際努力,以及必要的歷史機遇。期刊在讀者心目中的品牌地位的確立,便是期刊人代際努力與期刊傳統承續的自然邏輯結果。

三、學術期刊之於現實生活:究當如何觀照?

其實,此一論題與前述話題不乏密切聯繫。它所涉及的是學術期刊的定性與定位也即“刊格”這一基本問題。人有“人之為人”的人格,刊也應有“刊之為刊”的刊格。人格即人之為人的尊嚴、價值及其意義,刊格也即刊之為刊的本體論意義。

學刊的追求究竟為何?其主體性地位如何方可得以體現和踐行?這無疑涉及辦刊人的辦刊理念、境界及其賡續與傳承問題,即如何看待學刊的性質、價值及其意義的問題。換言之,我們是採行超乎經驗現實的形上思維和超驗主義辦刊理路,以學理探討為路徑,致力於對真知和真理的不懈追尋;還是拘泥於經驗現實,以經驗主義為辦刊路徑,急功近利地為經驗現實作註?換言之,是視期刊為探求真知的目的論存在,還是基於現實需要的工具論存在?

學術期刊與現實生活的關係,究竟如何定位?其實,學術期刊之存在,本身就是現實生活的一種呈現方式。換言之,學術期刊本就是現實生活的組成部分,它的存在無論如何也脫離不開時代背景的映襯與現實生活世界的約束。就此而言,那種以追求純然的學術為名,試圖割斷學術期刊與現實生活的內在聯繫的做法,似不足取。問題在於,學術期刊與現實生活世界的關係,究當如何定位與呈現?竊以為,學刊作為學術事業之有機構成,必須遵從學術的主體性原則,遵循學術研究之本然規律,進而以之為準則和前提去觀照現實,回應現實之所問。即是說,學術期刊必須以學術的方式、方法和準則,客觀地關注和研究現實生活世界,進而給出基於學術準則和學術倫理的獨有見解。在這裡,與現實生活世界保持必要的間距,“跳出現實看現實”,就成為求得之於現實生活的客觀性與本真性識見的必要條件。

在辯證法看來,前一階段事物的本質總是在歷史發展過程的後一階段才能顯露出來。^④就學術研究而言,對於事物之本質與規律,必須是在經歷一定的時空沉澱,待到歷史的塵埃落定之後,經歷冷靜的“回觀”與沉靜的省思過程,方可予以更為充分的揭示。常言道:“距離產生美。”借之於辦刊實踐,我們可以說:“距離產生真。”人之於事物本質的認知與求解,自然也與“距離”有關。只是,不同於日常生活世界之“距離”,在這裡,“距離”至少有三重意涵:空間距離、時間距離與利益距離。易言之,學刊之謂學刊,必得保持其獨有品格和純然趣尚,進而與現實生活世界保持三重距離。“空間距離”,自不必解釋;“時間距離”,即以“長時段”的歷史眼光,冷靜地回觀進而評判現實生活在諸領域的實踐;“利益距離”,即盡可能地脫開與現實生活世界的利益糾纏,以普遍性價值規則為指導,以便更為客觀和忠實地作出之於現實生活世界的解釋與評價。在這裡,所謂“距離”,無疑是主客觀二重距離的有機統一。1931年清華大學創辦《政治學報》,其發刊詞如是說:“宇宙須有動的思想,來鞭策時代的前進,同時要有一種靜的智識,作退一步的參考。”這一關涉辦刊理念的思想表

達,即是主張在辦刊實踐中秉持“動靜結合,以靜制動”的原則。顯然,之於思想的競爭,當下所呈現的只是思想互動的過程;思想競爭的結果,必有待於長時段學術史與生活史的檢驗。

進一步而言,深感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當然應以繁榮學術事業為本,因此不能逾越界限而辦成時政類期刊或宣教類期刊。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學術期刊就不應關注現實,就不應有人文情懷和社會責任擔當;而是說,學刊之為學刊,要通過學術的方式、通過思想理念提供者的方式去觀照和審視現實,而不應滿足於做現實生活的詮釋者、註解者。換言之,應當以知識者的擔當精神,處處顧及當前的問題。在這裡,重點無疑在“問題”——建設性地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不以“問題”為出發點,學術期刊無疑即失去其存在之意義。此即學術期刊之於社會生活的“無用之用”。這個問題涉及學術的獨立性——對現實生活世界抱持不即不離、若即若離的態度,且秉持衡平、持中的客觀理念。如前述,距離產生真。只有保持適度的距離,才可窺得事物的全貌,也才更有可能探知事物的本質。如果說,知識分子乃保健社會肌體的“啄木鳥”,那麼,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就是啄木鳥那韌中含銳的喙。

就其特性而言,學術是具有獨立追求的目的性存在,而非附屬於其他諸般存在的工具或手段。然而,在當下時代,學術期刊的本有功能面臨異化之虞,有必要重新賦予學刊以“意義”。常見的現象,是學術期刊違背學術為本的準則,喜好即時性、跟隨性地參與現實,對於現實生活世界的多變性則無所準備,缺乏前瞻與預見。其典型表現在於,編者對於稿件的擇取缺乏一定之“學規”,從而不時陷於尷尬之境地。如前些年某些期刊即時性刊發的對於“重慶模式”的研究成果,即因違背“沉澱性”或者“時滯性”原則,而不免難堪;甚而至於,是對自身“刊格”的解構。在某種意義上,秉持“沉澱性”或者“時滯性”之“以靜制動”的理念與原則,也許正是學術期刊區別於時政類期刊的奧義所在。

客觀地看,關於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學術性的尺度把握,確實是個“老大難”問題,於編者而言,通常難以拿捏。在筆者看來,遵循“沉澱性”或者是“時滯性”原則,為學術研究提供“沉靜的陣地”,以靜制動,靜中觀動,可能會更加合宜地處理好學術性與現實性之間的關係。從學術觀照的角度言之,只有給事物的發展演進以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也就是讓某一事物的發展過程比較充分地完成和展現,並且經歷一個由喧囂到冷卻的必要沉澱期,再予觀察和研判,所得出的結論將更富縱深感,方可更加符合歷史的真實,也才愈加具有體現事物深層結構意蘊的普遍性價值。

四、學刊選題之策劃：跟從時潮還是發掘潛在熱點？

如上所謂,我們執着於期刊的學術性,強調期刊應辦得厚重深沉;但這並不意味着要把學術期刊辦成不食人間煙火的“世外桃源”。學術期刊作為超驗思想與理論的園地甚至“助產婆”,天然具有“出世”之情懷;但這並不意味着學術期刊生活於“真空”而不食人間煙火,它終究還是要與現實生活實踐發生密切關聯。就筆者的視角來看,一個深切的辦刊體會是,期刊人似應以其“出世”與“入世”有機統一的人文情懷,運思於經驗生活與超驗世界之間;進而將其濃厚的人世情結,與干預學術走向的強烈願望,昇華並轉化為超驗理念,作用於期刊的內容建設。因此,作為刊界中人的另一個體會,就是在辦刊實踐中,力圖站在學術前沿,通過不乏現實情懷的專題策劃,積極主動地介入當下學術界,由學刊視角對學術之思潮予以“預流”,自覺充當當代學術史的創造者。

不言自明的是,作為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予現實生活世界以學理觀照——這是學術期刊的重要使命和必然擔當;問題在於以怎樣的方式予以觀照。1988年,本人曾就治學方法問題專訪政

治學研究資深專家高放先生。訪談過程之中，話題涉及學術研究與現實生活的關係問題，高先生給筆者留下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個見解，就是“理論研究一定要超前，要有預見性”。也就是說，我們的學術研究，對於現實生活世界的切入和觀照，應當採取的是前瞻式的創造性介入方式，以知識分子所應具備的深厚的學術素養和敏銳的理論眼光，對社會發展進程予以研判，進而形成學術成果，以自己的獨特方式服務於現實生活實踐；而不是如“馬後炮”一般，僅僅滿足於做一個寡淡無味的現實生活世界的“詮釋者”和跟從者。老子有言：“無之以為用。”從政治生活的角度看，學術之於政治生活的“用”，不在於其直接、現實之“用”，而在於其“無用之用”——所謂大道無形，大音希聲。易言之，即在之於諸般現實生活領域的超越性和超前性之“用”。

更為理想的辦刊方式，是進行可持續的專題性選題策劃與組織，形成內容上的適度集中和欄目上的集群效應，以實現某一個點位的突破；由之，通過此一亮點，吸引讀者注目，形成眼球效應，進而帶動期刊的整體性發展。所謂集群效應，就是期刊內容的集中度。只有提高辦刊內容的集中度，才能形成集群效應，也才能引人注目。換種說法，這就是在明確風格特色定位前提下的“歸核化經營”。

只是，將“歸核化經營”之理念具體落實到選題策劃以及與之相關的欄目設置，似應遵循和堅持“以學為體”的本體論原則，以之觀察與研判現實生活，找尋與發掘“熱點”之所在。即是說，以學人所應具備的敏銳而又不乏歷史感的眼光和超驗之形上認知能力，預見現實生活之未來走向，測知人所未識的社會生活潛流，進而作出學理性研判，最終凝練而成選題策劃方案，此之謂“預知潮流”和“發掘熱點”。隨之要做的，是通過專題欄目設置，完成針對現實預期熱點的提前“埋伏”。由此而成的潛在熱點及其選題，因其屬於預知判斷而極富前瞻性，而不乏超越時空的長時段的“當下”意義，得以長存於相關學科或領域之學術史，而深具學術史價值和意義，因之也便間接延展着期刊自身的學術生命週期。否則，面對紛繁複雜的現實生活世界，在選題策劃過程中，如果期刊人失卻之於“以學為體”的本體論原則的堅持與篤定，丟掉了對個刊自身獨有個性與風格的堅持，面對光怪陸離的現實生活世界，所作出的選題策劃浮光掠影，亦步亦趨，甚至心猿意馬，如此便被變動不居的時潮所淹沒，從而迷失了自我，甚至丟卻了期刊“我之為我”的獨有存在價值，而難逃被淹沒於眾刊之林的宿命。

五、學刊影響力追求：趨“硬”還是就“軟”？

有人說：“作者將一本書寫完，並不等於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這部作品的人是讀者。”^⑤這句話是作者之於讀者共鳴的重要性的極為深刻的感慨和認知。其實，對於學術期刊的編者而言，又何嘗不如此？一位深富學術情懷與社會擔當的學刊編者，即在於以自身的學養與職業操守，與作者一起，共同完善並成就着一篇文章，共同促進着學術的繁榮，進而接受讀者的評鑒。同理，編者將一本期刊編輯完成並如期出版，並不等於這一期的完成；這一期的最終完成者，實則是期刊的讀者。讀者的評價，是學術期刊每一期的編選成功與否的最終標準。只是，對於學術期刊而言，不同於休閒類期刊，其讀者往往一身二任，既為讀者，又是作者。不論是在既往的紙媒時代，還是在當下的數媒時代，讀者佔有的多寡表徵和決定着期刊影響力的強弱。進一步，當讀者身份轉換，由讀者而作者之時，他的學術寫作是否通過呼應、商榷或引註來回應一本期刊及其所刊文章，更是深層次地折射着一本學刊之學術影響力的大小。正是在此意義上，作者擬就一篇學術文章，並不等於其作品的最終完成；真正完成這部作品的人，非讀者莫屬。

就學術期刊影響力而言，不可一概而論，更宜把它區分為兩個類別：“硬影響力”與“軟影響力”。且編者之於二者的追逐，也應保持大致平衡，不可有所偏廢。所謂“硬影響力”，就是指以二次文獻轉載比率和影響因子為主要量化指標所體現的學術影響力。此種指標式硬影響力所及，主要限於學術圈層，屬於圈內影響力。而所謂“軟影響力”，主要指源於期刊的品牌建設和內容經營而產生的口碑式或史載式影響力。此種影響力不完全能夠通過影響因子等量化指標來衡量與體現，而是由學術共同體甚至學術圈層之外的知識化社會公眾來衡量和品評。由於它不是通過硬性數據來衡量，而是通過讀者口碑來體現，因而是為軟性存在。上述兩種評價方式所映射出的期刊影響力，無所謂高下優劣，所以，應兼而顧之，不可偏於一端。否則，就有可能走向絕對，從而傷及學術期刊，甚至危及學術事業的總體發展與繁榮。但可以肯定的是，比較而言，從時空延展性的角度予以研判，以被二次文獻轉載比率和即年影響因子、兩年影響因子等為指標的硬影響力，在時間意義上只具有當下性，在空間意義上只具有業內性；與之相反，以載入學術史和超長半衰期為主要標誌的軟影響力，在時間意義上則更具歷時性和延展性，在空間意義上超越業界範疇而具有廣泛的社會性。換言之，比起“硬影響力”的時空限定性，深具時空穿透力的“軟影響力”更具超時空屬性，因而更為持久和廣泛。打個不一定恰當的比方，“硬影響力”就像美味快餐，口味極佳但並非耐人尋味；“軟影響力”則類於純糧佳釀，歷久而彌香。之於“瞬時主義”與“長期主義”兩種影響力，究當如何擇取，決定於辦刊人的不同價值理念追求。

人類個體的成長，必然經歷從自然生理成熟到人格逐步成熟的漫長演化進程。一本學刊的成長亦復如是，同樣要經歷從創刊起步到青蔥歲月再到成熟持重直至刊格養成的漫長歷程。只是由於辦刊人之辦刊理念和境界的差異，而使得同類期刊的不同個體，從創刊伊始的青澀到形成穩定可持續刊格所需要的時間進程大為不同，更不要說形成“軟”、“硬”兩種業內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的時間成本了。

觀察學術期刊界不同期刊成長發育的客觀進程，即會發現期刊成長的三重樣態：多數期刊不乏外在“自然生理”從青澀到成熟的過程，但缺乏刊格養成、形塑到成熟的內在“精神生理”自覺，因而此類刊人的辦刊實踐也許並非缺乏情感投入，但總是難免給人以“西西弗斯式努力”的感覺；與之相對，少數期刊外在“自然生理”與內在“精神生理”同步共進，最終成長為不乏“軟”、“硬”影響力的名刊大刊；還有一小部分期刊不免令人惋惜，此類期刊內在“精神生理”本已趨於成熟，且已漸成自身風格，因此業已形成一定的美譽度和影響力，但由於未能經受住主客觀因素變動的考驗，輕率地否棄了難得形成的“自我”，“精神生理”重回青澀，一代代刊人辛苦塑就的良好刊譽隨即歸零，着實令人惋惜！

六、“扶植新人”與“延攬名家”：一身二任還是各有取捨？

學術期刊宜將培養學術新人和延攬大學者的雙重使命與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因此，作為編者，既要盯緊名家，以組約優質稿件，但又不應患“名人效應”綜合症，過於在乎作者的名號；而是應適度擇優發表學術新秀的作品，為其提供賴以成長的園地。否則，學術期刊“扶植新人”的社會責任便無以承擔。擴而言之，失卻學術期刊之於學術新人的扶植，學術事業的接續與傳承便會面臨停滯之虞。退一步說，一本期刊及其編者如果只是注目於名家，那是否也要捫心自問：名家究竟緣何而來？名家自非天外飛仙，亦非一夜間所能速成，而是學者主觀努力與客觀造就的邏輯結果。一本學刊的編者，如果雙眼只是注目於名家，豈不是別人栽樹，你來乘涼，甚至不勞而獲，輕易摘取他人

的“勝利果實”？而且，一本學刊如果不能通過“扶植新人”的方式，代際性地培育相對固定的作者隊伍，使之即使成名成家，無論在情感還是理性上仍然自覺地親近你、靠攏你，成為一本學刊賴以形塑自身風格的基幹力量，那麼，某種意義上便意味着期刊經營的失敗。

“扶植小人物，延攬大學者”，二者有機統一，相得益彰，是筆者所參編《文史哲》賴以立足刊界乃至學界的一大傳統法寶，也是其引領學術創新的重要途徑，更是《文史哲》七十餘年來廣續不變的辦刊傳統。

在《文史哲》的作者隊伍中，固然不乏執學界牛耳的大方之家，但《文史哲》從來不因此而輕視“小人物”。創刊伊始，《文史哲》就把“扶植小人物”當作自己的學術使命，着意發掘和推舉富有潛質的學術新秀。華崗社長特別作出規定，每一期的作者之中必須有一名“小人物”。在《文史哲》的識拔和鼓勵之下，一批青年學者脫穎而出，由此走上了自己的學術研究之路。李希凡、藍翎、李澤厚、汝信、龐樸、湯志鈞、韋森等著名學者或在《文史哲》發表了其處女作，或在《文史哲》發表了其成名作。20世紀50年代，李希凡、藍翎“兩個小人物”因為重評“紅樓夢研究”而橫空出世，以及毛澤東因此寫給政治局部分同志的公開信，就是因為《文史哲》扶植小人物、倡導新的研究範式而引發。李澤厚先生的第一篇學術文章《論康有為的〈大同書〉》，就發表於《文史哲》1955年第2期。2005年李澤厚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說：“你說我在美學大討論中一舉成名，其實在那以前我就很有名了。我第一篇文章《論康有為的〈大同書〉》，1955年4月發表。一些老教授很吃驚，不知道這人是從哪兒冒出來的。有外國朋友來信，稱李澤厚‘教授’，其實我只是個實習研究員。”^⑥著名經濟學家韋森的大學本科畢業論文，也是其處女作，即被分為上下篇連載於《文史哲》雜誌。

而今，《文史哲》編輯部正在通過系統性地舉辦“《文史哲》青年學者工作坊”的方式，以及“只認稿件不認人”的“雙向匿名三盲審稿制度”，制度化地發現和扶植“小人物”，以光大“培育學術新人、扶植‘小人物’”這一優良傳統。

七、學刊編輯之角色定位：“專精”還是“雜博”？

關於編輯角色定位，是走職業型專家之路，還是走編學兼修的“雜家”之路？結合業界同仁的編輯實踐，在筆者來看，做一名“雜家”，可能更符合編輯實踐的內在角色要求和學術期刊編輯規律。^⑦尤其是類似筆者這類從事人文類“小綜合”或“大專業”學術期刊的編輯工作，雖然面對的是文、史、哲三科的分科稿件，但由於這三門學科傳統上的合一性與交互性，即對責任編輯的學科背景和知識素養提出了更嚴苛的會通性要求。社科“小綜合”或人文社科“大綜合”期刊的編輯角色定位亦同此理。作為一名人文社科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編輯，如果學科出身單一，所受專業訓練過於狹窄，知識結構受限，總會時時感覺到對於本職日常工作的力所不逮。故而，每逢年度選題策劃等編學互動活動，也就難以發現和提出超越學科的形上問題或話題；當然，也就不能滿足綜合性學術期刊之於編者的角色要求。

尤其是，當我們把學術期刊視作一種神聖的精神產品，而不是簡單的“無機拼盤”，進而試圖把編輯的職守發揮到極致，使之成為深具能動性和創造性的高層次精神活動而不僅僅是“修理匠”的時候，學刊編輯活動之於編者寬口徑的學科背景以及相應的學術訓練的高標準要求，自然也便順理成章。

由此可見，所謂“雜家辦刊”，隱含雙重內涵。一是就編輯主體而言，須確立編研結合、編研相長的學科自覺，進而實現“編”與“學”的對象性互助、互補、互長與互成；一是通過一定的人事制度

改革和相應的約束激勵機制建構,打通編、研、學之間的人為壁壘,實現學者身份與編輯身份的一身二任和有機統一,從而將富有專業學養的專家型學者吸納、充實到編輯隊伍。

人才是事業的基礎,學術期刊事業同樣如此。創刊伊始,《文史哲》就奠定了“學者辦刊”的優良傳統,^⑧這一傳統賡續七十餘載而不斷。也正是得益於“學者辦刊”這一“編統”,《文史哲》才真正成為學術的園地,學者賴以成長的搖籃。20世紀80年代《文史哲》時任主編丁冠之先生,就是“編輯要當雜家”理念的積極倡導者,而且主張“編輯學者化”,做學者型編輯。對此主張筆者深以為然。當然,這是專就職業編輯而言。職業編輯雖然有自己的專業職守,因此也有自己的專業研究方向,但具體到邀約與編輯稿件,則應打破學科限制,具備跨學科組稿和編稿的技能。初時,責編可能不太適應此種高標準要求,久而久之,隨着在編輯實踐過程中的不斷學習與磨礪,以及與不同門類專家學者的交往,眼界變得日漸開闊起來,之於相近學科逐漸熟稔起來,自然也便遊刃有餘。所以,《文史哲》雜誌的責編,往往都是跨學科組編稿件,這由文末責編落款便可明瞭。

在編輯隊伍建設方面,《文史哲》雜誌一直以來的做法,即在於編輯人員編輯職能與學者職責的一肩雙挑,形成編研結合、編學相長、編學互成的有機生態結構。在編輯之餘,責編盡可能地擠出時間從事專業研究工作,編研相長,互為助益。也正是得益於“編研結合、編研相長、編學互成”的編輯理念,《文史哲》厚重、紮實的辦刊風格,才得以不斷發揚光大。作為配套措施,一直以來,編輯隊伍的職稱評定都是歸於科研教學系列。而今,編研結合、編研互長、以研促編,已然成為《文史哲》編輯部的“編統”與“學統”。

八、綜合性學刊：“學科導向”還是“問題導向”？

緣於工業革命以來知識分工步頻的日益加速,當下時代,學科劃分更趨細密、專業分工日益精細,甚至陷於碎片化窘境。其社會後果便是,專擅解決部門性技術問題因而“以術為本”的專業匠人如雨後春筍;而以深摯的學養為基礎,從人類整體命運和未來出發,全域性地供給形上理念的“以學為本”的思想大師日漸稀缺,以至於有海外學者發出如此慨嘆:“我們沒有思想了!”^⑨尤其是,在細分的學科範式下,探討現代人的時代困境,大多聚焦於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的專業領域。但是在學科化的限閼裡,生命的意義,歷史的厚度,種種支撐我們的“真實性”也同樣被消解。在學術日益專業化、人的視野日益狹窄的今天,要看到宏觀趨勢反而更加不易。^⑩

人文社科學界的學科化與專業化分工的日趨細密,必然映現於學術期刊界,其典型表現即在於專業期刊的大量湧現,以及綜合性期刊的普遍萎縮。物極而必反,“反者,道之動”。與學科越分越細的趨勢相反,我們感覺到一個以學科融合為內質的綜合的時代即將到來,因為我們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本身已越來越帶有綜合的性質。也正是學科劃分的日趨細密專精所造成的學術研究的技術化以及相應的視野窄化,使得以學科交叉與融合為主要特徵的“新文科”走上前台。在此時代背景之下,重新審視與評價綜合性學術期刊的性質與地位,也就恰逢其時。只是,對於綜合性學術期刊界之辦刊實踐的實然狀態及其應然取向,也需要重新思量與定位,方可真正消解學界乃至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已然形成的對於綜合性學術期刊的負面認知。

綜合性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辦刊現狀,呈現出如下幾種不同樣態:其一是以一二級學科為欄目題名的無機化大拼盤,各學科平均用力,互相之間缺乏以主題凝練為線索的內在邏輯關聯,走的是編輯方針趨同、編輯模式趨同、欄目設置趨同,甚至探討的社會熱點問題也趨同的“泛綜合化路子”^⑪;其二是“軟硬菜”大拼盤,即由一兩個主打學科欄目帶動多個附屬學科欄目,勉強見出些微學

刊特色的辦刊模式；其三是半專業化有機組合，即有意識地向專業化靠攏，但限於所在主辦單位的科研力量以及刊名的約束，尚在半綜合、半專業之間猶疑徘徊；其四是專題化有機組合，即以專題統領學科、以專題融合學科、以專題打通學科藩籬的專題式辦刊模式。上述四種辦刊模式或樣態，既是對目下辦刊實踐與模式的大略歸類，內中無疑又潛含着一條由低到高、漸次遞進的“升維”路線圖，反映着辦刊人的辦刊理念從不自覺到半自覺再到自覺的線性進程。其中最後一種辦刊模式，代表着綜合性學術期刊未來發展的新方向與新欲求，體現着辦刊人最為充分的主體自覺意識；同時，它也更有可能滿足學界希圖“看到宏觀趨勢”的心理訴求。概而言之，綜合性學術期刊的成長與發展，既面對着巨大的挑戰，又面臨着新的機遇。^⑫

其挑戰在於，“拼盤式”無機組合辦刊模式，所造成的期刊特色不彰；而其機遇在於，轉而以問題為導向，調動多學科的集群優勢，實現學科交叉，凝練創新性學術話題或研究方向。所以，我們不能只看到綜合性學術期刊的不足，而忽略其為專業性學術期刊所無法比擬的超學科優勢。當然，這一優勢只不過是一種有待發掘的潛在狀態，而非信手拈來；是否能夠將其發掘與釋放出來，要視乎辦刊人的學術境界和辦刊水準而定。等而上者，能夠以前瞻性眼光，通過專題性話題的創意、策劃和組織，把綜合刊的不同學科捏合成一個有機整體，以之展現辦刊人的學術追求與情懷；等而下者，則囿於大拼盤的無機層次勉力生存，維持而已。作為試圖有所作為的編者，當以靈活多樣的組織形式，緊密地參與和融入到學術生產環節，以便更加直接地發掘學術話題，發現潛在作者。《讀書》2017年第5期發表一篇題為《如何把握我們這個複雜的時代》的文章。文章認為，當下人文學科存在總體性危機，而總體性危機一定需要相異學科的協同研究，以求得恰切的化解之策。“由於目前的學科壁壘，在進入各自學科之前，很重要的事情大概是前學科的描述。對現實的把握是最容易產生對話的地方。較一致的前學科描述或可彌補各學科間的差異。”這一有關人文學科危機的解決辦法的考量，所給予綜合性人文學術期刊辦刊人的啟發，是必須處理好具體學科與超學科之間的關係，既不能陷於具體學科、糾纏於瑣細問題不能自拔，也不能脫離開具體學科、盲目求大而變得空疏無根。適宜的操作思路，應當是沿着“前學科—學科—後學科”的路徑，策劃與組織綜合性人文學術期刊的謀篇布局，如此方可找到綜合刊的恰切定位。

具體言之，無論是選題、話題還是欄目的組織策劃，都應基於綜合刊的跨學科屬性，從超越具體學科的“前學科”層面，即中觀或宏觀視闕出發、切入與考量；一旦進入稿件的組約環節，則宜從具體學科入手，微中知著，小中見大，尋求專業化的解決方案與答案；而最終的標的，則又是從具體學科中游離出來，進入“後學科”的寬廣視界，尋求超學科的普遍性學術價值和意義。這一過程，也可以用“抽象—具體—抽象”三部曲來表達。如此，即找尋到了綜合性人文學術期刊不同於專業性期刊的獨特定位，從而形成與專業刊之間清晰的區分度。

在此背景下，人文綜合刊的特色和風格，則靠其歷史沿革、傳統優勢、學科或專題側重的差異來體現。一個公理性的辦刊原則就是：影響力取決於集中度。抓住集中度做文章，無疑就抓住了辦好學術期刊的牛鼻子。

在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辦刊理念上，本人主張進行以主打欄目為核心的“歸核化”經營，即構建以主打欄目為軸心的同心多元體系，形成圍繞同心圓之圓點的“集束簇”及其向心力，從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與個性化定位。而在概念範疇上，則可將“同心多元體系”、“歸核化經營”以及“專題設計集束簇”，視作衡量綜合性學術期刊有機辦刊程度的概念性工具。^⑬

由於“同心(有機)多元化經營”以主打欄目為軸心，因此，它比“無機多元化經營”——毫無特

色與個性的一二級學科命名之欄目拼盤——具有更大的競爭優勢；它主張期刊依據自身優勢，進行差異化分工，各自培育不同於他刊的特色優勢欄目，進而形成個性化的核心競爭優勢。此正謂：“不做第一做唯一。”

九、學刊評價：在定量與定性之間

無疑，有關學術期刊究當如何評價，是業界近些年來“高燒不退”的熱門話題。^④是走定性評價之路，還是走定量評價之路，抑或走定性與定量雙結合之路？顯然遠非辦刊人所能自主抉擇。一個顯見的事實是，當下的學刊評價，量化為主、定性為輔的基本格局已然形成。且由於此種評價方式與結果為業務主管部門所照搬，上升為行政性判定標準，走向規格統一化、格式化和定型化，因此對於業界的導向作用更是日加顯明。

行政性量化評價導致期刊界功利主義辦刊思維盛行，甚至出現刊界生態危機。行政性外部評價體系對於刊界辦刊主體性思維的束縛，導致功利主義與策略主義辦刊思維盛行，而以長周期、長時段學術史建構為主導的戰略性辦刊思維嚴重缺失。

與戰略性思維缺席相應，策略主義思維在刊界大行其道。所謂策略主義，是市場主體基於自己的功利性判斷而作出的效用最大化市場選擇。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界作為一個“類市場”，自其進入計量時代始，尤其是當量化評價體系的評價指標與結果被業務主管部門“挪用”而升格為行政性量化評價標準之後，同業之間的高度競爭態勢，用“慘烈”來形容，似也不為過。為了實現對於影響因子的最大化追逐，進入或保住來源期刊，某些業者難免急功近利，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地採用一切有助於目標實現的技術、策略和手段，而不論其公平、正當與否。表現為或大幅度減少其刊文篇次，或組織“互引聯盟”，或與作者建立有償引用關係，不一而足，形成事實上的“虛假引用”和因此而生的“扭曲評價”，從而嚴重惡化了行業心理與業界生態。^⑤

行政性量化評價不分學科屬性，以影響因子“一把尺子量天下”，導致綜合性期刊一窩蜂撲向應用學科，爭相搶佔影響因子“高地”，以至於“零被引”論文被戲稱為“殭屍論文”。此一趣好進一步傳導至學界，影響所及，冷僻小眾學科乃至獨門絕學的相關研究成果難以見刊，相關研究人才流失，傳統學科遭致嚴重削弱。反映在績效評估上，就是迫於嚴峻的定量排序壓力，業者極端關注與追逐短時態影響因子指標，甚至出現“影響因子崇拜”症候群。諸多綜合性學術期刊甚至不惜變更辦刊宗旨與方向，置期刊的既有學科與專業特色於不顧，計不旋踵地向應用型高被引學科變移。行政性“量化剃刀”的“一刀切效應”，消滅的是事物的自然演化規律與差異化發展格局，尤其不利於只具有“無用之用”、並無現實功利之用的人文學術期刊的生存。此種“反生態”做法，使得有些名刊為幾代期刊人層累而成的獨有期刊風格這一無形資產，一夕之間坍塌而蕩然無存。

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的量化評價，尤其是“兩年影響因子”偏好，過於看重期刊的當下影響力，而不太注重考察期刊的歷時性學術貢獻即學術史價值（量化評價體系所謂“半衰期”），導致刊界唯影響因子是從，一味趨新、媚時，追逐焦點和熱點話題，造成對學術研究發展規律的無視甚至闖割。如此，便在客觀上弱化了期刊的純然學術追求和學術史價值的錨定，更是限制了期刊人對於長遠辦刊思路的謀劃與布局，進而導致戰略性思維大面積缺席。^⑥

基於行政性量化評價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我們認為，學術評價應當遵循學術研究自身的邏輯與規律，以及共同體約定俗成的規則性共識。

尊重學術期刊發展生態規律乃至學術進步生態規律的評價體系，起碼應當具備這樣的特點：內

容評價而不單是形式評價；非功利性評價而不是功利性評價；非建構性評價（擴大評價主體基數，實行較大範圍的自發性讀者民主評價）而不單是建構性評價；中長時段評價（着眼於學術史積澱與貢獻）而非短時段評價（以致盲目逐追時潮熱點、諛世媚時）。其中，最為緊要的一環是：評價方式宜採行同行多元定性評價（“代表作制”及“抽查制”並行）與量化評價相結合、專家（精英）評價與讀者（民主）評價相結合的基本原則。換言之，超越淺表性、“一刀切”的行政性量化評價。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多維、多元複合式評價，取代一維、一元簡單化評價，目的在於回歸學刊的本來面目和本真使命，保護、保守、光大期刊得之不易的自身既有傳統與風格，鼓勵一眾期刊之間各擅勝場的差異化、特色化競爭——合作之中有競爭、競爭之中有合作的互補式競合關係，此之謂合乎生態法則的良性競爭，而非採用不當手段操作數據的惡性競爭。換言之，它所鼓勵的，應是各個期刊在保有自身既定風格與特色基礎之上的競合格局；它所推動和探尋的，應是整個期刊界的個性化、多樣態發展格局與路向，以最終服務於學術事業的繁榮與發展。如此，方可實現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兼而得之的評價正義。

十、刊際關係認知：“同構化自在”還是“差異化競爭”？

作為期刊的編輯者，其看待與認知期刊的視角自然不同於界外之人。換言之，界外之人尤其是學術工作者對於期刊的認知，一般會抱持“工具論”或“園地論”態度，只是把它視為服務於學術研究甚至是某種宏大理論敘事的載體即附屬工具，因而並不關心具體某份期刊的生存論價值或本體論意義——這與業務主管部門通常持有的看法大同小異。在作者眼中，期刊之間的差異，只在於權威程度的高低、特色的有無和學術影響力的大小。

而在學術期刊界，之於期刊的定性和功能定位已如前述，大致有“被動性自在”與“主體性存在”兩種認知或態度。“被動性自在”觀點的持有者，一般而言也是抱持“工具論”或“園地論”態度，僅僅把學術期刊視為服務於學術研究甚至是某種宏大理論敘事的得力工具，因而覺得無需刻意塑造與凸顯表徵期刊獨特生命價值的刊風與刊格，只要按部就班地做好服務於學術研究的本職工作，就算萬事大吉。以此辦刊理念為指導的辦刊實踐，體現於編作關係，便是看天吃飯、等米下鍋，並不謀求“走出去”了解學界動向，更不會去積極聯絡作者。與之相反，富有主體性編輯理念自覺的期刊人，則首先把期刊視作一個有機生命體，一種自有其刊風、刊格與學術意志的主體性存在。易言之，在富有主體性編輯理念自覺的期刊人眼中，學刊首先是一種應當按照一定的編輯理念予以形塑、因而具有自身位格的個性化存在，它應當充分體現和反映期刊人的建構性編輯理念與學術自覺，而非局限於自然成長與演化、因而缺乏主導理念、將“自我”消弭於無形的被動性自在。如是，在此類期刊人視野中的學刊，便具有了某種獨特而鮮活的生命意義，自有其刊風、刊格與尊嚴，因而必須賦予其存在的獨有生命價值和存在論意義。以此辦刊理念為指導的辦刊實踐，體現於編作關係，便是以“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積極進行自我營銷，致力於“編作共同體”建構，以培育與期刊風格同聲相應的基幹作者隊伍。

期刊人對於期刊性質及其功能的不同認知，決定了期刊人之於刊際關係認知的殊異。在視期刊為“被動性自在”的期刊人眼中，刊際關係自然就是“同構化自在”，不同期刊只不過是芸芸眾刊中的一員，同類期刊陣營中期刊的增減，不過是數量的變動，並不具有質變的意義。以此認知為主導，學術期刊的所謂追求，便是作為芸芸眾刊之一員，只須以期刊界的“同構化自在”為基礎，因應學術研究的共同趨向與潮流，而不必去刻意追求自身獨有風格與氣質，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個性價

值。學刊群體“同構化存在”的客觀實態呈現，便是期刊群體的共性淹沒個性，相互之間的競爭關係往往呈現出“同質化死磕”的樣態。其典型表現即在於，A 刊與 B 刊所設主要欄目與主打選題幾近雷同，二者之間在內容上的區別度和辨識度極低，讀者只能通過裝幀設計樣態的差異甚至刊名來辨別。而在視期刊“主動性存在”的期刊人眼中，刊際關係應呈現為以多樣性和多樣態存在為前提的“差異化競爭”關係。個刊應在契合自身實際的編輯理念的指導下，通過系列化和可持續的選題策劃，刻意凸顯自身的個性化特徵或主體性存在，以實現同業之間在差異化競爭中共生的良好生態。借用亨廷頓的說法，它不是“馬賽克”式的同質化拼裝，而是“大熔爐”或“番茄湯”式的異質間融會。^⑦此種競爭以內容的差異化及其互補為前提，競爭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競爭，因此，它在性質上屬於合乎生態法則的良性競爭，它所呈現的必將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有機辦刊生態。

結 語

由上述十對關係或十個兩難問題的簡要梳理與分析，或許可以約略性地抽象出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理想樣態。即是說，它應當是有血有肉、有其刊風刊格和鮮明個性的主體性精神生命存在，而非僅僅是滿足於學術成果機械搬運與轉化的無機化存在。與之相應，辦刊人也自當有其鮮明的主體精神與刊格意識。正是辦刊人主體精神與刊格意識的有無，決定着一本學刊之刊格與個性的有無與高下。甚至至於，由編學關係而言，辦刊人主體精神與刊格意識的有無以及期刊刊格的豐薄，一定意義上決定着學術思想界整體“研格”之高下。

無論是綜合性還是專業性學術期刊，理想的辦刊方式，也許是在釐清上述諸般關係的基礎上，進行基於自身獨有風格的、可持續的專題性選題策劃和組織，形成內容上的適度集中和欄目上的集束效應，^⑧以期實現某一點位的集約式突破；進而通過這一濃墨重彩的光點與亮色，吸引讀者注目，形成眼球效應，帶動期刊的整體性發展。只有提高期刊選題與內容的集中度，形成集束簇，才能產生集群效應，塑就獨特優勢和獨有風格。而所謂獨特優勢與獨有風格，即是“不可取代性”。如果能夠把一本期刊辦到“不可取代”的高度與境界，作為刊界中人，我們自然也就不必再憂戚會罹患心理焦慮症了。

①在本文成稿之際，恰值某同業微信群熱議仲偉民、溫方方《目前社科期刊面對的十個矛盾與難題——社科期刊的外部壓力與內部應對》一文。有微友覺得該文所討論的實則是刊界十大關係問題。無巧不成書，拙文所涉恰恰也是自覺較為重要的十對關係性問題或兩難選擇問題。只是，本文關於“十大關係”的提煉難免有主觀之嫌，未必都是為業界所普遍矚目的“大問題”、“大關係”。不當之處，敬乞諒察。

②劉京希：《從學術期刊角度看學術素養與論文寫作》，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年第4期。

③林柳逸：《許紀霖再談“五四”：世界主義的文明比較遮蔽了中國本土文化的主體性》，“界面文化”公眾號，2022年4月2日。

④鄧曉芒教授的講座“什麼是歷史”，武漢大學“弘毅講堂”系列學術講座第227期，2012年3月6日。

⑤韓秀：《在中國上學插隊的美國人》，北京：《炎黃春秋》，2010年第2期。

⑥馬瑞芳：《扶植小人物的〈文史哲〉》，北京：《中華讀書報》，2012年11月7日。

⑦近年來相關話題的討論及其進展，可參見姬建敏：《新世紀二十年中國高校社科學術期刊研究熱點、問題與進路》，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2年第3期。

⑧“學者辦刊”或“編輯學者化”，是個頗有爭議的話題。仲偉民、溫方方認為，“編輯學者化”本非問題，但由於人事制度的原因，人為地在編輯與學者之間製造了一條體制上的鴻溝，主觀上造成部分學術期

刊編輯尋求學者身份而不得的苦衷；從客觀上講，則體現了目前很多學術期刊逐漸喪失學術品位、盲目追求形式或者技術美的尷尬（仲偉民、溫方方：《目前社科期刊面對的十個矛盾與難題——社科期刊的外部壓力與內部應對》，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鄒曉東也認為，每一位學刊編輯（學術編輯）都應該不斷歷練“觀察學術潮流，前瞻學術大勢”的能力。長遠來看，“學者辦刊”的呼聲與實踐會趨於復興（鄒曉東：《論“學者辦刊”——圍繞“高品質的學術期刊就是要堅守初心、引領創新”展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李章印在小範圍討論中對於“學者辦刊”的做法所面臨的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疑慮：學者總有自己的學術視域，人文學術又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有統一的範式，學者化的編輯所能引領的只能是自己研究方向範圍內的事情，超出自己範式的學術論文則可能會受到排斥。而且，這在根本上是一個無解的問題。出路只能是，讓遵循不同範式的學者做不同的學術編輯，並以此取得平衡。田衛平則對“編輯學者化”概念持否定態度，認為編輯學本身就是一門學問，編輯就是學者，何來“編輯學者化”之說？主編過分追求學者化，帶來的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主編職業角色的錯位與缺位（田衛平：《學術期刊主編的角色》，北京：《光明日報》，2004年12月23日）。

⑨這不是一個思想創造的時代，而是一個思想鞏固的時代。半個世紀以來，人類幾乎沒有任何重大思想創新，而是在不斷鞏固以往的思想創造。技術不斷地迭代更新，改變了人們思考的方向，卻並未改變人們思考的深度，反而造成了社會整體的思想濃度不斷下降。參見少年X：《以思想史為鏡，可以正三觀》，先知書店“私產人文”公眾號，2022年3月27日。

⑩金觀濤：《消失的真實：現代社會的思想危機》，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序言。

⑪張耀銘：《學術期刊與學術創新》，鄭州：大象出版

社，2021年，第98頁。

⑫業界就此問題的研討，可參見朱劍：《鑒往知來：五年來學術期刊研究的十大熱點（2017—2021）》，太原：《編輯之友》，2022年第4期。

⑬劉京希：《學術期刊的學術史價值及其追求——基於〈文史哲〉的辦刊實踐》，濟南：《山東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

⑭參見朱劍：《破除“SCI至上”與學術評價體系的重建》，北京：《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7期；劉曙光：《關於“核心期刊”及學術期刊評價機制的幾點思考》，湖南岳陽：《雲夢學刊》，2004年第4期；陳穎：《學術評價和學術期刊評價若干問題之我見》，武漢：《評價與管理》，2016年第4期；王浩斌：《學術共同體、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之內在邏輯解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5年第3期。

⑮劉京希：《化危為機：計量時代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困境與出路》，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年第3期。

⑯劉京希：《還“被引半衰期”以應有之位——學術期刊的量化評價》，北京：《中華讀書報》，2021年9月15日。

⑰塞繆爾·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143頁。

⑱集群效應是個生物學名詞，它是指同種生物聚集在一起生存所產生的良好生態效應或有利作用。在此借用於學術期刊建設，集群效應就是指期刊選題之較高的集中度，以及期刊內容建設之“問題導向”的系統性和內在關聯度。

作者簡介：劉京希，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教授，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副理事長。濟南 250100

[責任編輯 劉澤生]